

主编 刘士林 洛秦

桃花三月望江南

朱逸宁 著

相对于人类的漫长历史，即使数千年的时光也仅仅是短暂的一瞬而已。但是，有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历史瞬间，往往隐藏着许多重要的、承前启后的因素，使得一种文明悄然向着某种方向而不是其他方向演变。在中国的文化史上丝毫不缺乏这样的细节，江南城市的出现和发展便是一个典型例子。其独具特色的精神文化甚至影响了整个民族。在都市化进程日益加速的今天，我们时常困惑于成长中的大都市复杂的文化生态，总是在试图找寻现代中国的精神之源。其实，不妨把目光投向这片容易被人忽视的地带。在一个十分遥远的年代，那里正在上演一幕幕动人心魄的悲喜剧，而这一切都与中国文化的现在与未来发生着深远的联系。

芒福德曾说：『城市从生长、扩展到崩溃瓦解这个周期常常重复着，其原因之一可能在于文化性质的本身。我们已经看到，在许多情况下，城市趋向于把社区有机多彩的生活禁锢在僵化的、过分专门化的形式内，这个形式为了求得自



013068948



桃花三月望江南

主编 刘士林 洛秦

朱逸宁 著

I267.1
1461



北航 C1676614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桃花三月望江南 / 朱逸宁著. —上海: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13.6

(中国风: 江南文化丛书)

ISBN 978-7-80692-873-8

I. ①桃… II. ①朱…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12480号

书 名: 桃花三月望江南

编 者: 朱逸宁

责任编辑: 夏楠 鲍晟

封面设计: 陈雪琴

出版发行: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汾阳路20号

印 刷: 上海天华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150千字

印 张: 13.25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92-873-8/J.837

定 价: 38.00元

本社图书可通过中国音乐学网站 <http://musicology.cn> 购买

主编人语

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

想好好地做一点江南的书，这个愿望实在是不算短了。

每登清凉山，临紫霞湖，看梅花山的灿烂云锦，听秦淮河的市井喧阗，这种想法就会更加难以抑制……更不要说在扬州瘦西湖看船娘腰肢轻摇起满湖涟漪、在苏州的网师园听艺人朱唇轻吐“月落乌啼霜满天”，以及在杭州的断桥边遥想许多已风流云散的“三生石上旧精魂”了。这是一片特别容易招惹起闲情、逸致甚至是几分荒凉心的土地，随便一处破败不堪的庭院，也许就是旧时钟鸣鼎食的王谢之家，而山头上一座很不起眼的小小坟茔，也许深埋的就是曾惊天动地的一泓碧血……而在江南生活的所有诗性细节之中，最令人消受不了的当然要算是还乡感了。特别是在明月之夜、风雨之夕的时候，偶尔走进一个陌生的水乡小镇，它一定会勾起那种“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人生沧桑。在这种心情和景物的诱惑下，一个旅人会很容易陷入一种美丽的幻觉中，搞不清楚此时此刻的他和刚才还在红尘中劳心苦形的那个自我，谁的存在更真实一些，谁的音容笑貌更亲切温柔一些……

然而，毕竟是青山遮不住逝水，一如江南佳丽总是难免于“一朝春残红颜老”的命运，像这样的一种诗性江南在滚滚红尘中的花果飘零，也仿佛是在前生就已签下的悲哀契约。而对于那些生逢其时的匆匆过客们，那交集的百感也不是诗人一句“欲说还休”就可以了断的。一方面是“夜深还过女墙来”的旧时明月，另一方面却是“重过阊门万事非”的江边看月之人；一方面是街头桂花的叫卖声、桂花酒酿的梆子声声依旧，另一方面却是少年时代的长干、横塘和南浦却早已不可复闻；一方面是黄梅时节的细雨、青草池塘的蛙鼓依然如约而来，另一方面却是采莲、浣纱和晴耕雨读的人们早已“不知何处去”；一方面是在春秋时序中的莼菜、鲈鱼、荸荠和茨菰仍会历历在目，另一方面在夕阳之后却再也没有了夜唱蔡中郎的嗓音嘶哑的说书艺人，还有那辰辰美景中的旧时院落，风雨黄昏中的客舟孤侣，浅斟低唱的小红与萧娘，春天郊原上的颜色与深秋庭院中的画烛，以及在江南大地上所有曾鲜活过的一切有声、有形、有色、有味的事物。如果它们的存在不能上升到永恒，那么还有什么东西更值得世人保存呢？对于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万物来说，还是苏东坡的《前赤壁赋》说得好：“盖将自其变

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对于一切已经丧失物质躯壳的往昔事物，它们的存在和澄明当然只能依靠语言和声音来维系。用一种现代性的中国话语去建构一个有生命的古典人文江南，就是勉励我们策划“江南话语”并将之付诸实践的最高理念和实践力量。就像东山魁夷在大自然中写生时的情况一样，漫步在美丽的江南大地上，我们也总是会听到一种“快把我表现出来”的悲哀请求。而有时这种柔弱的请求会严厉得如同一道至高无上的命令，这正是我们必须放弃许多其他事务而首先做这样一件事情的根源。

记得黑格尔曾说古希腊是“整个欧洲人的精神家园”，而美丽的江南无疑可以看作中华民族灵魂的乡关。尽管正在人们注目中的这个湿润世界，已经更多地被归入历史的和怀旧的对象，但由于说话人本身是活的、正在呼吸着的生命，因而在他们的叙事中也会有一种在其他话语空间中不易见到的现代人文意义。让江南永远是她自身，让江南在话语之中穿越时光和空间，成为中华民族生活中一个永恒的精神家园，这就是《江南话语》希望达到的目标和坚持不懈的人文理想。

2003年7月7日于南京白云园

目 录

主编人语·····	(一)
上篇·····	(一)
楔子:江南城市的时光之旅·····	(二)
从蛮荒中走来的江南·····	(三)
吴姬荡桨过江南·····	(九)
江南的血泪传奇·····	(一四)
樵李乾坤·····	(二〇)
白云深处有歌声·····	(二五)
大地上诗意的栖居·····	(二九)
石头城下起波涛·····	(三八)
欲望之城与诗性都会·····	(四八)
山阴道上桂花初·····	(五五)
梁武长歌·····	(六三)
比城墙更牢固的是文化·····	(七二)
下篇·····	(八九)
江南在何处·····	(九〇)
江南命运的转折点·····	(九七)
国家不幸诗家幸·····	(一〇一)
花间一脉·····	(一一〇)
台城依旧叹金陵·····	(一一七)
吹皱一池春水·····	(一二一)
无言独上西楼·····	(一二六)
远去的航海梦·····	(一三一)

目 录

商女亦知亡国恨·····	(一三四)
于市井处做道场·····	(一四五)
最是金陵绝佳处·····	(一五六)
故国山河旧都情·····	(一六九)
城市日常生活中的诗意·····	(一七七)
锦帆应是到江南·····	(一九九)
后记:梦入江南烟水路·····	(二〇二)
修订后记·····	(二〇三)
附录一·····	
附录二·····	
附录三·····	
附录四·····	
附录五·····	
附录六·····	
附录七·····	
附录八·····	
附录九·····	
附录十·····	
附录十一·····	
附录十二·····	
附录十三·····	
附录十四·····	
附录十五·····	
附录十六·····	
附录十七·····	
附录十八·····	
附录十九·····	
附录二十·····	
附录二十一·····	
附录二十二·····	
附录二十三·····	
附录二十四·····	
附录二十五·····	
附录二十六·····	
附录二十七·····	
附录二十八·····	
附录二十九·····	
附录三十·····	
附录三十一·····	
附录三十二·····	
附录三十三·····	
附录三十四·····	
附录三十五·····	
附录三十六·····	
附录三十七·····	
附录三十八·····	
附录三十九·····	
附录四十·····	
附录四十一·····	
附录四十二·····	
附录四十三·····	
附录四十四·····	
附录四十五·····	
附录四十六·····	
附录四十七·····	
附录四十八·····	
附录四十九·····	
附录五十·····	
附录五十一·····	
附录五十二·····	
附录五十三·····	
附录五十四·····	
附录五十五·····	
附录五十六·····	
附录五十七·····	
附录五十八·····	
附录五十九·····	
附录六十·····	
附录六十一·····	
附录六十二·····	
附录六十三·····	
附录六十四·····	
附录六十五·····	
附录六十六·····	
附录六十七·····	
附录六十八·····	
附录六十九·····	
附录七十·····	
附录七十一·····	
附录七十二·····	
附录七十三·····	
附录七十四·····	
附录七十五·····	
附录七十六·····	
附录七十七·····	
附录七十八·····	
附录七十九·····	
附录八十·····	
附录八十一·····	
附录八十二·····	
附录八十三·····	
附录八十四·····	
附录八十五·····	
附录八十六·····	
附录八十七·····	
附录八十八·····	
附录八十九·····	
附录九十·····	
附录九十一·····	
附录九十二·····	
附录九十三·····	
附录九十四·····	
附录九十五·····	
附录九十六·····	
附录九十七·····	
附录九十八·····	
附录九十九·····	
附录一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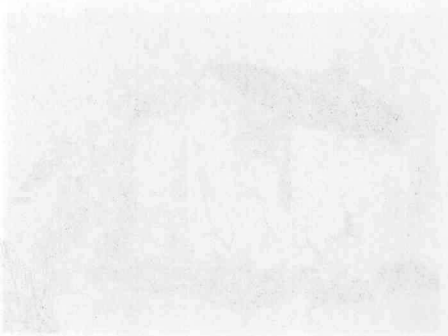
上 篇

个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对
发展农村经济，特别是发展农村
经济，都给予了高度重视。特别是
中央，更是把农村经济作为全党
工作的重点，提出了“农业、农村、
农民”问题的战略思想。在这一
思想的指导下，农村经济改革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农村经济
体制改革，使农村经济焕发了
勃勃生机，农村面貌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经济
体制改革，使农村经济焕发了
勃勃生机，农村面貌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经济
体制改革，使农村经济焕发了
勃勃生机，农村面貌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农村经济
焕发了勃勃生机，农村面貌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经济
体制改革，使农村经济焕发了
勃勃生机，农村面貌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经济
体制改革，使农村经济焕发了
勃勃生机，农村面貌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经济
体制改革，使农村经济焕发了
勃勃生机，农村面貌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江苏城市 发展史

从人类文明出现以来，城市就成为
人类生活、生产、政治、经济、文
化、教育的中心。城市是人类文明
的结晶，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城市
的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
江苏城市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江苏就出现
了原始聚落。夏商周时期，江苏
出现了早期的城市。春秋战国时
期，江苏出现了封建城市。秦汉时
期，江苏出现了郡县城市。隋唐时
期，江苏出现了繁荣的城市。宋元
时期，江苏出现了发达的城市。明
清时期，江苏出现了鼎盛的城市。
近代以来，江苏城市的发展，更
是日新月异。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江苏城市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
江苏城市的发展，为江苏经济的
腾飞，为江苏文化的繁荣，为江苏
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水经注》中记载

江苏城市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江苏就出现
了原始聚落。夏商周时期，江苏
出现了早期的城市。春秋战国时
期，江苏出现了封建城市。秦汉时
期，江苏出现了郡县城市。隋唐时
期，江苏出现了繁荣的城市。宋元
时期，江苏出现了发达的城市。明
清时期，江苏出现了鼎盛的城市。
近代以来，江苏城市的发展，更
是日新月异。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江苏城市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
江苏城市的发展，为江苏经济的
腾飞，为江苏文化的繁荣，为江苏
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楔子：江南城市的时间之旅

江南这片土地，曾经让许多人魂牵梦绕。桃花三月，山阴道上，这原是江南最美的时节和景致之一，以此为缘起，可以细细观赏和品读一方水土，一段岁月。其中，既可以见到江南城市粗简的发端，又可以望见江南文化如歌的胜景，同时也不妨让我们一起思考江南城市文化的将来。



吴冠中《江南水乡》

相对于人类的漫长历史，即使数千年的时光也仅仅是短暂的一瞬而已。但是，有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历史瞬间，往往又暗藏着许多重要的、承前启后的因素，使得一种文明悄然向着某种方向而不是其他方向演变。在中国的文化史上丝毫不缺乏这样的细

节，江南城市的出现和发展便是一个典型例子。其独具特色的精神文化甚至影响了整个民族。在都市化进程日益加速的今天，我们时常困惑于成长中的大都市复杂的文化生态，总是在试图找寻现代中国的精神之源。其实，不妨把目光投向这片容易被人忽视的地带。在一个十分遥远的年代，那里正在上演一幕幕动人心魄的悲喜剧，而这一切都与中国文化的现在与未来发生着深远的联系。

芒福德曾说：“城市从生长、扩展到崩溃瓦解这个周期常常重复着，其原因之一可能在于文化性质的本身。我们已经看到，在许多情况下，城市趋向于把社区有机的多彩的生活禁锢在僵化的、过分专门化的形式内，这个形式为了求得自身的连续性，不去适应变化和进一步发展。城市本身的结构，如同石头容器一样，它控制着有吸引力的磁石，在过去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是产生阻碍适应发展和变化的原因。到头来，它使崩溃和瓦解（通过战争、大火或经济萧条枯萎）成为打开城市新生大门的惟一途径。”城市的衰落、灭亡和新生都有规律可循，而城市文化巨大的凝聚和吸引力正是促使其变化的根源。中国的古代都市既是权力整合与资源分配的产物，同时又体现着古老的中华民族对城市文明一种独特的诗性人文阐

释。因此，在世界都市化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出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和模式，这里面自然也有许多故事。

在此，我们即将开始一段江南城市的时光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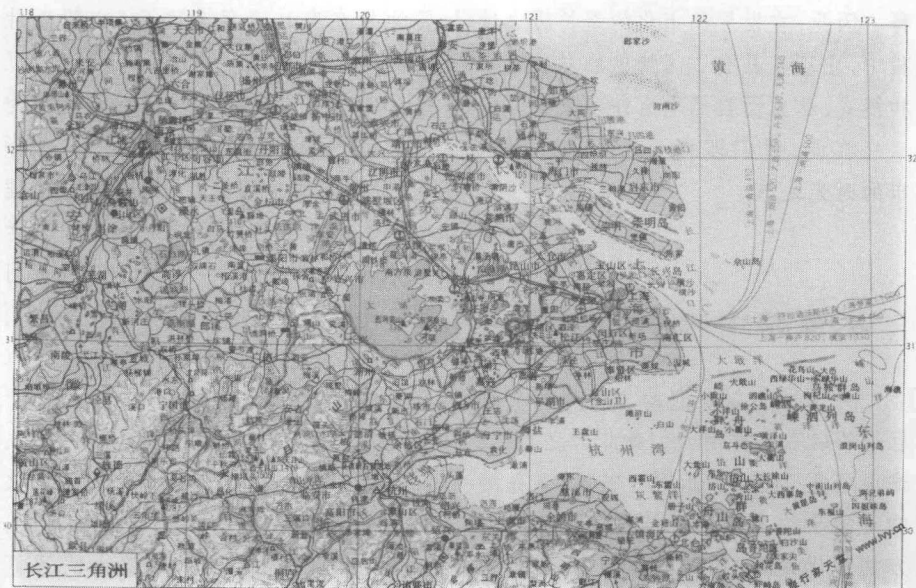
从蛮荒中走来的江南

一座城市以及它的文化如同一块巨大的磁石一样使人们如此为之着迷，这里究竟有什么原因呢？其实，最关键的是城市的文化精神结构。无论是西方的古代希腊，或是东方的中国大地，城市的历史如同一卷卷泛黄的书页，在向今天的人们昭示着一个民族曾经存在和即将到来的文化与生活状态。

在公元七世纪以前，存在着一个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江南，它似乎并不引人注目，但又时常发出嘹亮的歌声。它带着蛮荒和野性从远古走来，在和北方中原文明一次次对话和交融中渐渐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如同吴王和越王手中的利剑，让中原为之震惊。一个充满野性气息的童年阶段，正是每个民族在进入文明时期时所必经的阶段。正如马克思在评价欧洲时说过的：“（欧洲的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国的江南也不例外。更重

要的是在度过童年期之后，文明以什么样的姿态发展。在这一方面，中世纪后的欧洲文明是以现代科学精神为基础而开拓出不断向外扩张的文化形态；而东方的中国民族，则演变为伦理和审美精神并存的文化。由于中国古代文明中心的位置一直居于北方黄河沿岸地区，加之独特的权力分配体制的缘故，中国的城市精神形态经常以诗意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而处于权力边缘的江南更容易为人所忽视，但江南的城市文明恰恰是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不可忽视的部分。其实，江南的精神结构与中原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并不是严格按照权力分配体系的构架展开的，因此这种文化的表现形态也和北方文化有着很大的不同。江南具有代表性的一座座城市，星罗棋布，如珍珠般串起了如诗如歌的江南文化。江南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在于它和城市的密切关系，由于这种文化的成熟紧紧依赖于城市，这才导致了近代中国城市化的最高形态出现在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带。当我们审视即将形成的、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的时候，不应当忘记，在遥远的古代，这些如璀璨明珠一般的江南城市是怎样一步步走进我们视线的。

此时的江南城市，如同一个意气



丰饶的长江三角洲(长三角地图)

风发的少年,水乡泽国的地理环境使他具有一种质朴和灵秀的气质。同其兄弟中原城市相比,他的风采不仅散发于文人雅士的笔下,更凝结在一个个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而这种独具魅力的城市生活,也正是我们即将细细品读的那些如歌画卷。

从历史上看,中原地区正是中原文化体系的核心地带。而且,“夏商周三代可以看做是中原地区中、东、西地域实力此消彼长的动态发展;作为中国历时最久、内容最为纷繁的舞台,中原地区无疑成为历代王朝定都的最频繁的場所,长安、洛阳、邺、开封、太

原、北京……这些对我们来说再熟悉不过的古都城市都集中在这里。”(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这些都城集中在中原黄河流域,不仅是政治—伦理体系自身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讲,更是以一种古代都市群落的方式形成了北方伦理文化的社会基础。

北方中原地区历来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去过北京后,更令我加深了对这种政治伦理文化的感受。

北方城市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在生产条件被较早地破坏之后,北方的文化已经先于南方完成了蜕变。从古代典籍中有关“商王猎象”的记载来

看,至少在商代,中原的气候还是比较温暖和湿润的。但是到了周代,北方的气候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生活条件大不如前,这使中原地区必须采取一种更为集中有效的方式分配资源。这些城市的建立,可以说不仅是基于军事战略的考虑,从更深层次来讲,也是对分配关系的重大调整。长期以来,北方都城每一次大的变动,不仅形成了一个新的城市中心,还造成了另一后果,就是使原本孤立的都市变为都市群落,其最明显的表现即“两都制”或“陪都制”。但从发展形态看,这种都市群落还无法和现代社会的都市文化圈相比,因为它的功能还不够全面和丰富,互相之间的文化联系还是短暂性或阶段性的。北方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它的地位多依赖

于政治权力。由于这种力量易于随政权更替而变动,因此北方城市最终没有发展为一股独立于政治的力量。也就没有出现近代威尼斯式的城市社会。与之相区别的是,江南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之中,逐步走上了一条与北方城市不同的道路。

早在中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长江下游就已经出现了一些诸侯国家,这时长江文化的发展与中原地区仍然是同步的。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现今的江南地区就出现了古越族人创造的文化。由此至少可以说明,江南在远古时期的文化之所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所谓的正统史学观,并不能说江南的环太湖地区文化是在一夜之间发展起来的,或者完全由中原文化



长江流域图

的辐射形成。现在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都显示：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同样重要，它们构成了文化渊源上的“二元”结构。

而与黄河流域的众多城市相比，长江都市群落的形成，同样是有其自身独特的摇篮和母体的，这一母体就是灿烂的长江文明。

现代考古学成果表明，相对北方黄河流域而言，位于长江中下游以及太湖流域的江南，自然资源和生环境大相迥异。如今学者已经证实，在史前时代，长江流域已经存在具有相当高度的文化。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江南出现了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据考证，“长江流域史前时期人们的经济生活，是以水稻为主的稻作农业文化，与黄河流域史前时期人们以种植粟为主的旱作农业文化，是属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生活。”（李学勤、徐吉军主编《长江文化史》）创作了长江文明的先民，拥有与黄河流域所不同的经济生活方式，这就是以种植水稻为主的稻作农业，实际上江南都市文化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正在于此。

稻作农业文化不仅是史前长江流域文化的一大成就，而且也是促使江南都市获得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据考古研究显示，在距今约9000年左右，今湖南澧县彭头山一带就出现了

稻作农业的遗存。距今约7000年左右，今河姆渡、马家浜、城背溪一带已出现了翻土工具—骨耜。

长江下游的河姆渡遗址，可以被视为远古江南地区文化发展的一个标志，因为它充分说明了在远古的太湖—钱塘江流域所具有的高度发达的文化是足以和黄河流域并称的。这时的江南地区，同样也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和源流。据考证，河姆渡遗址所代表的长江远古文化是与黄河文化所不同的文化形态。以下这段文字可以说明其特征：

两次发掘表明，河姆渡遗址有四个文化层：第一层距今约5200—4700年，第二层距今约5800—5500年，第三层距今约6400—5900年，第四层距今约7000—6500年。在河姆渡遗址的四个文化层中，第四层不但年代最早，而且堆积最厚，内涵最丰富，是河姆渡遗址的主要堆积层。在第四层的居住区内，堆积着大量人工栽培的稻谷遗存。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河姆渡第四层发现的稻谷遗存是亚洲年代最早的人工栽培稻。其数量丰富与保存完好，为世界罕见。第四层还发现成行排列的木桩和大量的梁、柱、地板等木构残件，总数有数千件之多，其中有大量榫卯残件，是我国最丰富的

榫卯构件遗存。在第四层，还出有彩陶、木桨、玉器和象牙雕刻的艺术品。

——董楚平、金永平等《中华文
化通志·地域文化典·吴越文化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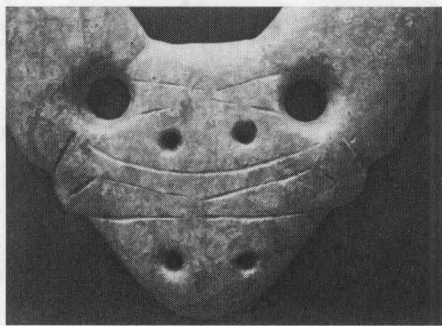
以上事实告诉我们，此时的江南农业已经不再是原始的刀耕火种方式，而进入了锄耕阶段。至良渚文化时期，更是进一步前进到犁耕阶段。如此高的稻作农业生产水平，加之手工业的不断发展，无不预示着长江流域文化必定会呈现出一派崭新的景象，这样的农业环境是与中国北方不同的。而在此基础上的文明的飞跃，则已经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这里所说的“东风”，便是城市的诞生。江南的声音也即将响彻中华大地。

据考证，因浙江余杭良渚遗址而得名的良渚文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这应该能够解释此一历史阶段长江文化的面貌：

大量的玉质礼器，大规模的“土筑金字塔”与祭祀建筑，以及超大型的莫角山人工大土台，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良渚文明的一部分“硬件”。中国古代建筑以木材为主，支撑这座文明大厦的木质“硬件”，已灰飞烟灭。还有其他“硬件”，也已烟消云散。与这些“硬件”相配套的，必有复

杂繁缛的礼制，那是中华文明的“软件”，也是中华文明的特色所在，这些文明“软件”更是与时光同逝了。要维持这座金碧辉煌、灵光四射的文明大厦，要养活一大批“冠带文明”、亦人亦神的人上人，良渚文化本族的平民是不堪负荷的。在那个时代，战争掠夺比生产劳动更为正当，在神的名义下，显得十分圣洁，正义非凡。于是，良渚文化的将帅们，捧着神秘的玉琮，挥舞威严的玉钺，奉神命而远征了。

——董楚平、金永平等《中华文
化通志·地域文化典·吴越文化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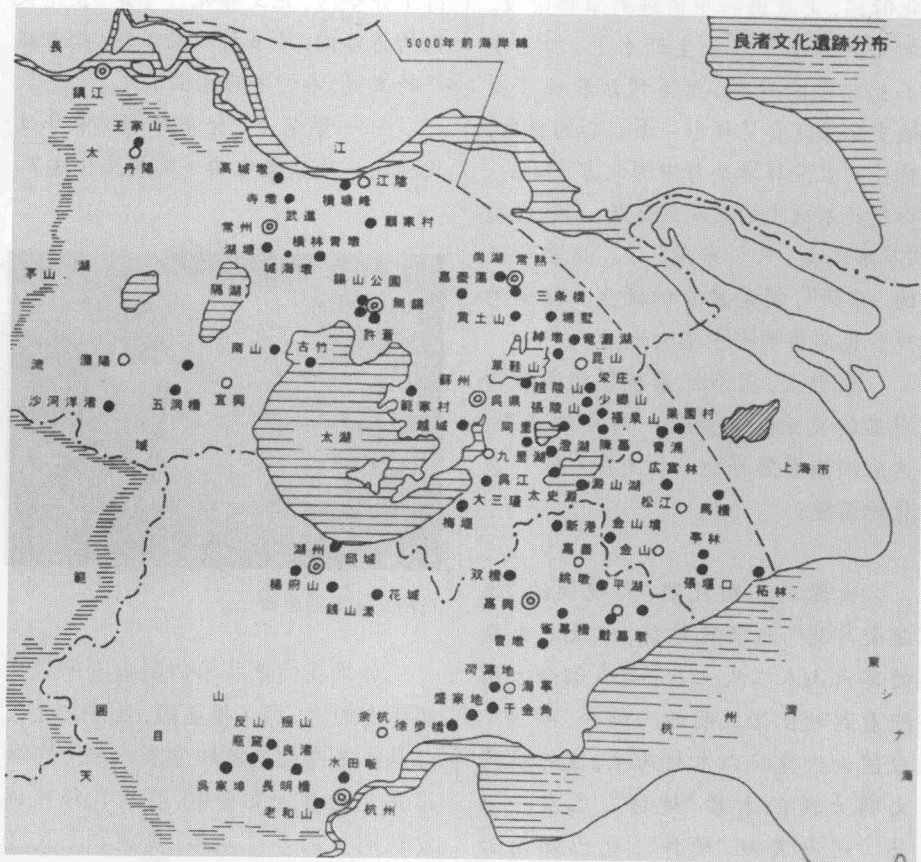


良渚文化玉器遗物

如果我们把礼乐体制也看作是文明标志的话，那么很显然，良渚文化已经具有很高的成就和发展水平。在良渚文化的考古发掘中，我们已经可以发现明显的等级差异，贵族和平民已经有了严格的区分。不过，这种礼乐

体制却没有最终在江南形成大的政治中心，而是逐步构建出长江流域独特的城市文明。就这一点来说，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上古江南地区的文明成就极高，其势力发展引起了中原部落首领禹的忧虑，因而借口“迟到”将其领导人杀之，后民众纷纷迁徙，加上自然灾害，导致良渚文化出现了断裂。

(杨东晨、杨建国《江南太湖和杭州湾地区的氏族部落探寻——简论新石器时代黄河与长江流域氏族的迁徙与融合》)我认为这种说法应是比较接近历史真相的，而且也能较好地说明黄河与长江礼乐政治发展过程的差异。关于这一点，还需要我们去进一步审视江南的青铜时代。



良渚文化遗迹分布图

相传,越人是禹的后裔。尽管这一说法来自中国古代历史学的权威著作《史记》,可仍然受到了很多质疑。不能否定的一点却是,在南方有很多所谓的“禹迹”,即和夏禹有关的历史遗迹。这似乎在向人们暗示:夏文化的范围不仅局限于中国北方,还曾到达长江流域,这种影响力使得江南原生态的文化很难在政治权力的分配上有所作为,此后历代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此基础之上,到了商代,长江中下游地区独特的文化形态以一种模式渐渐开始展示在人们的眼前,这就是以城市和乡镇为中心,将最高水平的文化成果逐步向某一地区集中,再通过这一地区向更广的地域辐射开来,而承担这一职能的地域就是江南城市群落。城市的文化集散能力保证了江南的大城市在一定程度上较少因政治权力更迭出现骤兴骤衰的现象。因此,我们方能在如今的江南看到这么多保存相对完整的文化遗存,从而解决了江南城市文化的起源问题。

因浙江余杭良渚遗址而得名的良渚文化向我们揭示了这一历史时期长江文化的面貌。如果我们把礼乐体制也看作是文明标志的话,那么,良渚文化在这方面已经具有很高的成就和发展水平。不过,这种体制却没有最终在江南催生出大的政治中心,而是逐

步构建出长江流域独特的城市文明。关于这一点,还需要我们去进一步审视长江的青铜时代。

吴姬荡桨过江南

在青铜时代,江南礼乐文明的发展水平并不低。这一时期从江淮到钱塘江流域主要有徐、群舒、邗、吴、越等诸侯国。而且,其中的徐、吴、越三国还曾经称雄一时,在青铜器上发展的水平相对也比较高。如宁镇和皖南地区出土的青铜时代土墩墓中的随葬品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这些证据表明:江南地区早期的礼乐文化总体上与中原地区相互交融,同时又带有自身的地区特点。可以说,礼乐政治因素此时也渗透到了江南,只不过已经被“江南化”了。这种交流是江南都市文化形成不可忽视的因素。

说到江南城市的历史传奇,话题要从春秋时期的吴、越两国开始。

早期的江南文化,虽然还以鱼稻农耕为主,但城市已经有所发展,而这正是江南进入文明时代的象征。无论是中原或是江南的城市文化,其原始的形态几乎相同,也就是以政治军事的功能为主,而且都是通过政治手段或行政命令来建设的。

相对于中原地区因气候环境变化而面临的复杂局面，江南的农业环境一直以来相对稳定，因此江南城市的发展速度普遍不快，江南地区的人们几乎不需要通过大的变革来改善生存环境，因而只满足于一种既“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史记·货殖列传》）的状态。换句话说，这时的城市在某种程度上只可算作“城邑”而已。尽管这种城市形态还很原始，但它毕竟为江南都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它表明：在“饭稻羹鱼”的环太湖地区，出现一种新的城市文明已是必然趋势，只是与北方相比，这一进程显得要缓慢得多。中原的人们也可能很难想象，南方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

正由于上古不同的生长环境，江南和中原的城市发展进程也就不完全相同。在此，我们不妨将其称为“中原模式”和“江南模式”。“中原模式”的产生基础是遭到破坏比较严重的农业生产条件，以及继之而出现的新的权力分配系统；“江南模式”则更多地依赖于优越的生活生产环境，由此诞生了以审美为核心的消费文化机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城市就不再是礼乐政治的附着物，而是一种诗意审美文化的体系。这一结构确保了江南地区都市化的进程可以较少受到政治权力

因素的制约，从而在日后产生出像建康、姑苏、广陵、杭州这样在中国城市史上独树一帜的文化都会来。在远古时代的长江流域，文明传播与进化的速度并不迟于北方，只是所采取的文明进化方式不一样。北方黄河流域的城市是在政治权力的影响下通过资源分配阶段的不断调节从而获得发展契机的，而江南城市从一开始就被剥夺了这种权力。尽管同北方中原地区相比，江南仍缺乏相对完善的文化政治中心，但这恰恰说明长江流域的城市将会走上一条与黄河流域不尽相同的道路。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古老的江南，这时的长江下游地区，有两个主要民族分别建立了国家——吴国和越国。经历了“饭稻羹鱼”阶段的吴越民族，已经初步走上了与中原大国相比肩的发展历程。

现代考古学表明，越王室乃是夏之苗裔，极有可能是从山东迁徙而来的。而现在的宁镇地区，也很有可能是商朝的边陲重镇。一般认为，在周文化影响下，经过“太伯奔吴”之后，如今的江南地区，又诞生了吴文化。吴文化与越文化相互融合，构成了江南文化的基础。

姑苏的建立是与吴文化的崛起密不可分，可以说，姑苏的诞生象征吴越文明和江南城市文化进入了全新的阶段。这段故事要从著名的“太伯奔